

文化
中国
世界
CULTURE
CHINA
AND
THE
WORLD
新论

甘阳 主编

童庆生 著

汉语的意义

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甘 阳 主 编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

汉语的意义

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童庆生 著

生活·**联信** 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 / 童庆生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ISBN 978-7-108-06286-4

I. ①汉… II. ①童… III. ①汉语—研究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7684号

责任编辑 王晨晨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10000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 数 296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52.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缘 起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世界之中国”或“亚洲之中国”的各种说法益发频频可闻。

但所谓“中国”，并不仅仅只是联合国上百个国家中之一“国”，而首先是一大文明母体。韦伯当年从文明母体着眼把全球分为五大历史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的理论，引发日后种种“轴心文明”讨论，至今意义重大。事实上，晚清以来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从未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而总是首先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看成是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强势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二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创办“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时，秉承的也是这种从大文明格局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视野。

而中国现代美术的方向就是要学西方美术的“写实主义”，所有这些都一方面是对西方美术的误解，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现代美术的误导。在文学方面，胡适力图引进西方科学实证方法强调对文本的考证诚然有其贡献，但却也常常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引入死胡同中，尤其胡适顽固反对以中国传统儒道佛的观点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立场更是大错。例如他说“《西游记》被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认为儒道佛的“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但正如《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教授所指出，胡适排斥儒道佛现在恰恰成了反讽，因为欧美日本中国现在对《西游记》的所有研究成果可以概观地视为对胡适观点的驳斥，事实上，“和尚，道士和秀才对《西游记》的了解，也许比胡适之博士更透彻，更深刻！”

同样，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认识仍然远远不够。这里一个重要问题是西方人对自己的看法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中。例如，美国人曾一度认为美国只有自由主义而没有保守主义，但这种看法早已被证明乃根本错误，因为近几十年来美国的最大变化恰恰是保守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具有广泛民众基础而且有强烈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倾向的美国保守主义，几乎超出所有主流西方知识界的预料，从而实际使许多西方理论在西方本身就已黯然失色。例如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预设之一是所谓“现代化必然世俗化”，但这个看法现在已经难以成立，因为正如西方学者普遍承认，无论“世俗化”的定义如何修正，都难以解释美国今天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人自称相信宗教奇迹、相信上帝的最后审判这种典型宗教社会的现象。晚近三十年来是西方思想变动最大的时期，其变动的激烈程度只有西方 17 世纪现代思想转型期可以相比，这种变动导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在被重新讨论，所有的基本概念都在重新修正，例如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今天都已不再有自明的答案。但另一方面，与保守主义的崛起有关，西方特别美国现在日益呈现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背道而驰的突出现象：知识精英的理论越来越前卫，但普通民众的心态却越来越保守，这种基本矛盾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巨大焦虑。如何看待西方社会和思想的这种深刻变化，乃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我们已经必须从根本上拒斥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这样的“拿来主义”只能是文化不成熟、文明不独立的表现。中国思想学术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中国文明主体性之独立立场的日渐成熟，这种立场将促使中国学人以自己的头脑去研究、分析、判断西方的各种理论，拒绝人云亦云，拒绝跟风赶时髦。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 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

承三联书店雅意，这套新编论丛仍沿用“文化：中国与世界”之名，以示二十年来学术文化努力的延续性。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

甘 阳

2007年中秋于杭州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语文学、世界文学和人文科学	15
	1. 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	17
	2.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Pascale Casanova)	23
	3. 佛朗哥·莫瑞蒂 (Franco Moretti)	32
	4. “世界文学共和国”与“世界公民”	36
	5. 人文科学和语文学 (Philology)	48
	6. 奥尔巴赫：语文学和世界文学	59
第三章	普世主义的政治：大众语、“原始语言” 和汉语	75
	1. 民族、现代性和罗曼语	81
	2. 白话、大众语和民族文学	90
	3. 罗曼司传奇和现代文学	103
	4. 民族语言的标准化：分离还是统一？	110
	5. “原始语言”的迷思	117

第四章	人造通用语、比较语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的形成	129
	1. 传教士的发明	133
	2. 完美的理性和不完美的语言	138
	3. 语言乌托邦的回响：“基本英语”和世界语	163
	4. 汉语形象的转变	168
	5. “印欧语系”之谜和比较语文学	174
	6. 世界的语文学：帝国主义和神秘主义	192
第五章	自我东方主义和汉语的命运	205
	1. 传教士和汉语改革	207
	2. 比较语文学和中国知识分子	222
	3. 自我东方主义：想象和创造	237
	4. 红色的语文想象：拉丁新文字	256

第六章	旅行的观念：重复、误读和传播	271
	1. “剽窃” 还是自我建构？	276
	2. “误读” 和想象：跨文化理解的伦理	284
	3. 汉语观的美学：一个未结束的故事	295
	4. 作为“事件”的汉语观	304
第七章	走向共同的文学	313
	1. 奥尔巴赫：“个别的”和“普遍的”	318
	2. 范式的转变：白话、小说和世界文学	325
	3. 共同的文学之路	341
	4. “世界”的“文学”	347
附录一	威廉·琼斯，第三次年会演讲	357
附录二	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论印度语言	377
参考文献		420
后记		442

第一章

绪 论

在社会科学中，知识进步的前提是我们在对知识条件的认识上的进步。

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的逻辑》^[1]

对语言的定义总是间接或直接的对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的定义。

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2]

-
- [1]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 本书所引英文文献中译文, 除注明出处的以外, 均为作者翻译。
- [2]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1.

西方（主要是西欧）在了解、研究和想象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言论、评论、意见和观点，为了便于叙述和讨论，我们不妨将其统称为西方的“中国观”。作为认知形态的观念（idea），既不同于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系统的理论架构，又有别于具体的、孤立的、经验性的、可实证的信息，虽不是经过严密的逻辑论证和系统的考据研究得出的结论，但相对于偶然的经验或个人的意见，又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普遍性和代表性。西方对中国文化、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读、再误读，想象、再想象，挪用、再挪用，构成了其中国观的主要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对历史上的中西交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转述复制，循环往复，历久不衰，留下的文献材料汗牛充栋。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的中国观仍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场景中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继续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面对浩瀚的历史文献，我们难免感叹学术生命的短暂，

时间的无情，纵然穷经皓首，仍有未曾涉猎或遗漏的文本材料和人物观点。这就给研究者提出了严肃的方法论上的问题。罗曼语语文学家、文学思想史家埃里奇·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在其著名的论文《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中指出，世界文学研究中最大的挑战首先是方法论上的，我们必须找到合适的“出发点”（*Ansatzpunkt*）和“抓手”（*handle*），^[3]研究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切入点的选择和材料的取舍。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在不同层面上考察西方的中国观，而我最关心、最感兴趣的则是西方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和想象。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有关汉语，尤其是汉语书面语的论述尤为丰富，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值得研究。当然，历史上论者有关汉语的观点五花八门，并不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他们论及汉语的原因或初衷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尽管如此，在研究方法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有关汉语的著述、言论视为一种集体的表述和话语形态（*a discursive formation*），为了讨论和叙述的方便，统称为西方“汉语观”。

汉语观不仅集中表达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对汉语的总体认识，更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社会 and 历史的总体想象中的核心内容，是其中国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审视、分析和研究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和想象及其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极佳的切入点和抓手。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汉语观同时也构成了西方现代思想史的一部分，是西方现代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

[3] 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 trans. Maire and Edward Said, *Centennial Review* 8, no. 1 (winter 1969), p. 14.

节和产品,故而同时为我们认识、解读和批判西方现代思想谱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不必囿于西方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识,同时可以考察西方语言思想和理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对“五四”前后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影响。对所谓“他者”的认识,无可避免地构成了自我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最终将影响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形成和发展并非研究汉语本身,也不是研究西方汉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尽管汉学学术体制的建立对后期汉语观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无意在西方汉学史的框架下讨论西方汉语观的发展和流变,总体上看,本书未涉及汉学家的中文研究。这首先是因为西方汉学作为建制内的学科出现较晚,在欧洲汉学的重镇,汉学专职研究教学职位的设立大都在19世纪后半期。^[4]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西方思想史视野下的汉语观。在西方思想界集体注视下的汉语与后来汉学研究中的汉语不尽相同:前者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简单的研究对象。在欧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汉语往

[4] 一般认为,欧洲汉学作为建制学科始于1814年。这一年,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第一任汉学讲座教授。相比于法国,英国学院建制内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牛津大学于1876年设立汉学讲座席位,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为首任教授,而剑桥大学汉学讲座席位创立于1888年,首任教授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有关西方汉学的发展情况,中国学界一直较为关注,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1949)(上海:上海书店,1989)应该是第一部较为系统介绍海外汉学的著作。另可参看 David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M. Wilson and J.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刘正,《图说汉学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往成为思想家们探索和思考语言起源和分布、人类史和世界文明史等宏大课题的重要材料、例证和参照系。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汉语的意义已不限于汉语本身，讨论汉语的目的不在于界定和确认汉语的特征，而是为了探索一系列关乎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问题。相比之下，汉学研究中的汉语是界限清晰的对象，汉语本身是研究的起点、重点和目的。所以，西方汉语观与西方对汉语的专业研究史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和范畴。

西方对汉语开始产生兴趣并开展严肃的讨论至少可以上溯到 17 世纪，历经几个世纪不衰。大致说来，欧洲对汉语较为系统的认识始于利玛窦。这位在中国传教长达十七年之久的意大利传教士身后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并以日记随笔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观察与认识。其《中国札记》用意大利语写成，由金利阁 1614 年从澳门带回罗马，整理辑集，译成拉丁文，于 1615 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并迅速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在欧洲广为流传。17 世纪出版的《中国札记》英译本只是摘译本，1625 年收入著名的《珀切斯朝圣者丛书》，而英文足本还要多等三百多年，直到 20 世纪中叶才完成出版。^[5]《中国札记》记录了利玛窦亲身经历的中国，是他直接观察、学习、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的总结，具有极高的史料文献价值，出版后立即成为欧洲中国观的重要

[5] Matthew Ricci,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trans. Louis J. Gallagher, with a Foreword by Richard J. Cush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3 [1942]).

来源。^{〔6〕}其中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为西方汉语观定下了基调，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历代西方思想家论述汉语的参照和材料来源。18 世纪末、19 世纪初，随着比较语文学（comparative philology）的兴起和发展，欧洲历史上积累的汉语观成为包括施勒格尔兄弟、洪堡特、谢林、黑格尔等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家和语文学家讨论中国文化、社会、民族和政治的常见的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充满偏见和歧视的观点、立场和看法，进一步充实和强化了汉语观的东方主义倾向。然而，讽刺的是，20 世纪初中国学者对流溢着帝国主义思想和情绪的比较语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罗家伦、毛子水，以及稍后的季羨林等，都曾在外国留学期间研习过比较语文学或与其相关的梵文和“印度学”，其中傅斯年更是在建制的层面上依据比较语文学的学科范式，于 1928 年推动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7〕}

西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有关汉语的言论、观点、态度等，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辗转挪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语言文字和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 19 世纪末激发了声势浩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表现出明显的“自我东方主义”，有意无意地接受并传播西方汉语观，在中国

〔6〕 See Translator's Preface to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 xvii. 另见中译本《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 见张谷铭，《Philology 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第 2 分（2016 年 6 月）。